

马 鞍 村 的 百 年 聚 散

——中国村庄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

吴文勉 武力◎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振德 Tel: (010)68319284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平面设计
huazi103@vip.sina.com

ISBN 7-5017-7599-0



9 787501 775996 >

ISBN 7-5017-7599-0/F · 6315
定价：36.00元



马鞍村的百年沧桑

——中国村庄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

吴文勉 武力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鞍村的百年沧桑:中国村庄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吴文勉,武力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6

ISBN 7-5017-7599-0

I. 马... II. ①吴... ②武... III. 村史—马鞍村 IV.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732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万百庄北街3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王振德(010 68319284)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华子图文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君升印刷公司

开 本:A5 印 张:12.5 字 数:337千字

版 次:200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7599-0/F·6315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68319284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前言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社会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尤其是农村和农民。国有国史、县有县志,现在一些乡镇也撰写了“乡志”“镇志”,但是就一个村庄来说,把自己 100 年来的发展变化写出来,实属不易,更何况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没有发生过令人瞩目的大事,没有出现过不同凡响的人物。也正因为马鞍村仅仅是苏南农村的一个普通村庄,它的经历也很平常,才使我们更能从平凡的历史中、从不经意的事件中看到历史演变的规律。

一、撰写马鞍村史的目的和条件

(一) 中国村庄经济的特点

20 世纪的中国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 1949 年以前,村庄并不是一个经济单位,它只是一个有许多农民和地主聚族而居的社区,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也只是加强了对村民的政治控制。但是自 1956 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特别是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村庄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行政单位,而是变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经济单位“大队”。这种集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了 20 余年的时间,就苏南地区的农村来说,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产。即使在 1997 年无锡地区实行乡镇企业的“转制”以后,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经济和资产仍然在农村现代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像马鞍村这样集体经济薄弱、被郊区政府列为“扶贫村”,集体经济和资产仍然在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不再作为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也不再像过去的大队、生产队那样是农村经济的经营管理者,它成为村民的自治组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委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并不意味着村庄(行政村)作为农村的基层单位的意义正在淡化。恰恰相反,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今天,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村委会正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作为村民选出的机构,代表着全村的共同利益和实施社区各个方面的管理;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乡镇政府向下延伸的管理机构,担负着贯彻政府意图、承担政府交办的具体事务的责任。就村民来说,土地在实际上归村集体所有、宅基地的审批、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的提供,都要仰赖于村这一级单位。即使在人口流动已经相对自由的今天,村委会在管理本村人口(如口粮田、责任田、计划生育、社会救济),以及外来人口管理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20世纪的村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50年里,村庄在农村里实际上充当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作用、成为相对稳定的农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组织,因此了解以村庄为单位的农村、农业、农民的变化,也许可以补充从国家或区域的宏观角度以及从家庭、企业角度研究的不足,增加对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和农民的认识。

(二) 撰写马鞍村史的条件

本书正是为加强村庄研究而撰写的一部反映一个村庄在20世纪发展历史的著作,我们之所以在无锡和保定地区的22个追踪调查村庄中首先选择了马鞍村,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马鞍村具有比较好的写作条件。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的相对落后,即使在无锡这个中国农村最发达的地区,在村里要找到一个能够承担写作村史的人也很困难,一是受文化限制,二是受知识限制(一般年轻人有文化,但是对本村历史了解感受较浅,年岁大的人对本村历史知之较多,但是一般文化不高写作有困难),三是受精力和兴趣的限制(即使前面两个条件都具备,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为此吃苦

受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同志来写,则感到掌握的材料有限,恐怕难以深入进去。1998 年在进行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我们在马鞍村发现了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人,这就是本书的主要作者吴文勉同志,吴文勉同志 1929 年生于马鞍村的前吴巷,他不仅有文化,而且作过 20 余年的大队(村)会计,对马鞍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比较了解,同时由于他人际关系比较好,在马鞍有口皆碑,进一步收集资料和访谈也很容易。最难能可贵的是,吴文勉同志尽管已经 70 高龄,但是报效国家和社会的热情至今不减,令人感动。

第二,吴文勉同志撰写村史,不仅得到郊区政府和乡政府有关机构以及村委会的积极支持,而且得到村里许多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如土改时期的农会主任、第一个互助组组长王望荣,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杨兴初,高级社第一任会计王岳清,以及第一个外出工作的王金秋,旧中国最后一任保长王全生等都提供了大量历史情况。另外,曾经组织和参与 1929 年马鞍村邵巷调查(第一次无锡保定调查)的秦柳方、秦含章仍然健在,虽然已经 90 以上高龄,仍然能够提供当时情况。

第三,马鞍村的历史丰富多彩,既能够生动地浓缩中国农村上个世纪、尤其是后 50 年的变化,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马鞍的土地改革所反映的土地改革情况就很具有典型意义,又如马鞍虽然处于苏南,又是无锡的郊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却不是按照“苏南模式”发展起来的,却有着某些“温州模式”的特点,从其中的原因可以看出“苏南模式”形成和变化的条件。此外,马鞍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时期,是集体经济搞的比较好的大队,社员收入在胡埭公社排在前几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快形成了“集体穷、村民富”的格局,据说马鞍村民的平均收入在胡埭镇长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由于集体收入少,却被郊区政府列为“扶贫村”。马鞍村委会的职能实际上从 80 年代起就从经营集体经济为主转向为村民提供服务为主,村委会工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在无锡地区暴露的最早,它可以为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村委会作用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

(三) 马鞍村史的结构和史料基础

这本书的内容,从时间上来说,主要是叙述 20 世纪的 100 年里马鞍村发生的变化,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则,同时也由于后 50 年的史料比较翔实可靠,故叙述的重点是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从书的结构来看,则是尽可能地将历史脉络与逻辑分类结合起来。马鞍村毕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庄,人们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对书中的场景、人物和事件还是陌生的,因此,本书在前言里面,一方面简单介绍了马鞍村这段历史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则就马鞍村的这段历史及其特点,提出了一些思考性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

正文的 12 章,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1-2 章,主要是对马鞍村的自然环境、村的来历以及发展历程作了概况性的介绍。3-6 章,主要是对马鞍村的经济发展史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经济发展毕竟是其他变化的基础和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因素。7-8 章则是叙述马鞍村的社区管理、党、政、群组织以及村与国家的关系。9-12 章,则是这 100 年来马鞍村在人口迁徙、文教卫生、生活水平以及风俗文化的变迁。

马鞍村的村史,主要依靠三个方面的史料来构建的。第一,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文字资料,如家谱、村委会档案、胡埭镇有关统计资料、《胡埭镇志》,以及《无锡县志》等。第二,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于 1929、1958、1978、1998 年对马鞍村的四次调查资料。第三,是根据许多过来人和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互相印证的材料。

由于马鞍村既不是先进典型或旗帜,也不是落后或问题较多的代表,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不仅没有受到干扰,而且得到村里的历届领导和现任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非常坦荡,对该书的惟一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并且认为越真实就越好,就越有保存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对他们的支持和坦荡再次表示感谢。

二、20 世纪马鞍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的中国农村,是村庄经济和社区功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世纪。传统的中国村庄,是建立在“聚族而居”的宗族体系基础上的松散的行政单位,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自然或半自然经济,在 20 世纪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剧烈冲击。

第一,是来自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这一方面彻底改变了农村几千年来逐渐发展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使得农民在扩大与外部世界交换产品、吸收世界科技成果的同时,也使生产和消费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并大大扩展了其领域,这就是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农村现代化。

第二,则是来自经济体制变革方面的冲击。20 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外交方面受人欺凌、内政方面政治腐败的封建王朝末世。由此引发的激荡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救亡图存”和建立独立富强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并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线,并最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尽管革命胜利了,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但是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在令人堪忧。于是在 20 世纪的后 50 年里,迅速发展经济、彻底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为尽快达到这个目标,受认识的局限,整整半个世纪,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动,其变动之剧烈、影响之深刻,也是世界上少见的。

(一) 1900 - 1949 年的旧中国经济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传统农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最近 10 年研究的进展,说明中国在 1840 年以前的农业可以说是接近传统农业发展的顶点(这里所说的“传统农业”,是指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由于它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资源难以增加的条件下,就部分人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占有和转让耕地的使

用费来增加收入,但是从总体上说,众多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就不得不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兼业来实现。几乎可以说,从唐中期以来,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人们对耕地的占有欲望就超过了对劳动力占有的欲望,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不同于欧洲封建庄园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高于劳动力,而农业又是社会的主要产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的,并且吸纳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费(即租金)就较高,这不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经营更合算,佃农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租金,从而只能靠尽量增加耕地产出和从事家庭副业以维持和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对贫农和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家庭副业来解决。这里还不包括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赋不断加重的压力。因此,以雇农、贫农、自耕农为主体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就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而耕地单位面积上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则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并由此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即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流通交换制度和规模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文化等等。

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影响和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停滞、衰退然后再进入恢复阶段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建立和巩固阶段、发展和昌盛阶段、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大规模战争和改朝换代阶段。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过度压迫和剥削政策导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荡(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外,经济和政治的兴衰的深层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即土地由自耕农为主的分散占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这种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败,另一方面则使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直至土地集中所引

发的上述现象导致农民起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政府及民间引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由过去单一的地主占统治地位变成地主经济、外国在华经济、官僚资本占统治地位,由封建经济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这种经济形态又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1. 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回顾 100 年前,中国是在经济落后、受人欺凌、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进入 20 世纪的。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割地赔款、帝国主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和获得资本输出权力;另一方面,甲午战争暴露出的清政府无能和民族危机,则导致了一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将农民再次推上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政治舞台,而农民这种“盲目排外”的情绪又被愚昧的当政的顽固派利用,于是就演成了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其结果,是 1903 年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 4.5 亿两白银。如此巨额的赔偿,是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 5 倍多,因此不得不分 39 年偿还,年息 4 厘,本息共计近 10 亿两,再加上甲午战争的赔款 2.3 亿两,中国有限的财富和生产剩余的大部分被掠夺走,不仅政府靠举债度日,整个经济也因赋税过重而大伤元气,失去了活力。

1911 年 10 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政权落入了官僚、地主、买办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手中。如果说清政府尚能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那么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则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国内、国际资本主义化的强大压力下和自己力量的衰落,被迫放弃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实行“通商惠工”政策,放松了对民营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权落入军阀手中,但是资本主义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现代企业的强大生产力不仅为资产阶级、广大的市民和买

办认识到,也为掌权的大地主和军阀看到,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短暂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时期获经历了一次较快发展的短暂阶段。但是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基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也是清末民初中国经济的另一个特点。

2. 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于1928年继续北伐,1929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在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战争几乎没有停止,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前的22年里,就经济运行来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一是1927年7月至1937年6月的缓慢发展的10年;二是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实行战时经济统制的8年;三是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的国统区经济走向崩溃的4年。

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矛盾尖锐,导致了激烈的战争,使得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二是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三是自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入不敷出,导致了长达12年之久的剧烈通货膨胀。

3. 旧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在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民经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非常缓慢。第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余年间,由于中国经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现代经济发展缓慢,传统农业萎缩凋敝,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之间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较大差异。第三,中国的政治始终没有走上民主化

和现代化的道路,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成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通病。第四,长期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仅以1949年与抗战以前的1936年相比,农业牲畜减少26%,农用施肥量减少约27%,粮食产量减少21%、棉花产量减少45.6%。

(二) 1949 - 2004 年的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和四个时期。即:1949 - 1978年为第一个阶段,1979 - 2004年为第二个阶段;四个时期则是:(1)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工业化起步时期(1949 - 1957年);(2)探索自己道路和国民经济的曲折发展时期(1958 - 1978年);(3)初步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1979 - 1991年);(4)深入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走向成熟时期(1992 - 2004年)。

在第一个阶段,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阶段,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55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55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而5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迁,也基本上受上述的政府权威和三个目标所制约的。55

年来的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1)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在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令人瞩目。(2)经济发展波动性大。从 1953 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至今,经济增长经历了 9 次波动。(3)政府主导型经济。55 年来,受资源条件、赶超战略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始终实行着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4)追求共同富裕。

政治上,新中国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高效廉洁的政府。在 1978 年以前,受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几乎无所不包,忽视了法制建设,人民在就业、迁徙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尤其是城乡分隔和人民公社制度,束缚了农民的自由。就农村来说,新中国最大的政治特点,就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乡村地主豪绅统治,建立了直接贯彻政府意志的现代农村基层政府组织。

三、马鞍村历史所揭示的几个问题

古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知著”。马鞍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提出这些问题,供读者研究。

1. 苏南农村企业发展的历史启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都是在既有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思想文化等给定条件下进行的。上述条件必然对新的发展和变革选择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过去我们研究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往往对历史的联系不够注意。马鞍村的历史说明,无锡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除了原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还有其历史经验。换句话说,近代以来的无锡农村,甚至农业,已经具有很浓厚的商品经济性质了。农民的市场意识和机会成本观念非常明显。就农业来说,旧社会饼肥、河泥的大量使用、30 年代以后抽水机的普遍应用,都反映出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实行了家庭以外的分工和交易。再以蚕桑业和纺织业为

例,早在近代以来,胡埭地区就存在了公司加农户这种分散生产、产品统一销售的组织形式,企业和农民通过合作,都可以降低自己的管理成本、风险成本甚至流动资金。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即反映了长期形成的通过市场合作的观念和生产过程的分解。

另外,马鞍村 20 多年来兴办各种企业的历史还说明(其实这也是苏南普遍存在的现象),除极少数企业能够成长壮大为大型的现代企业外,大多数企业都是屡起屡仆,没有成长,这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技术,而是受市场和资金的限制,很难扩大。他们更愿意以为大企业加工产品零件的方式,以自己的工资和管理低成本以及分担大企业投资和风险的优势来生存。这实际上是过去公司加农户形式的扩大,即公司加小企业。实际上,就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家庭或比家庭更大一些的作坊性工厂,由于其工资低、管理成本低和很难脱离大公司生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生产和供销组织形式将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可能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个特点。

2. 苏南模式的成长条件。马鞍村处于典型的苏南模式发祥地无锡,与周围的村庄相比,马鞍村是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晚的村庄(1983 年),但是它在 80 年代初期并没有走上集体企业大发展的道路,反而在 1983 年包产到户以后,个体和私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胡埭有名的“集体穷、村民富”的大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说明了即使在苏南,“苏南模式”的形成也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些条件是什么?

马鞍村在 80 年代集体企业没有顺势而起,具体原因有四个:第一,马鞍村迟至 1983 年才实行包产到户,并不是因为集体经济搞得不好、农业比重低和群众不愿意,而是乡村两级主要领导的反对。由此造成群众对村领导的失望,集体经济失去吸引力;第二,马鞍村的人才优势在于建筑业方面,但是乡里怕马鞍村成立建筑队会对其建筑队造成竞争(人才和业务),在 80 年代始终不批准马鞍村成立集体性质的建筑队;三是包产到户后,马鞍村还具有一个发展运输业的好时机,

由于其利润高、适于个人经营,使集体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第四,村领导在投资方面的失误。上面四个原因,除第三个原因具有特殊性,第四个原因哪里都可能发生外,第一、第二两个原因,则反映出:在相同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领导的思想和决策对于集体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就总体来说,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较高外,农业边际效益已经走到尽头,绝大多数乡村干部认识到发展非农产业的重要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当时集体经济与个人相比,具有明显的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

3. 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费用问题。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如何解决现代社区管理和公共产品费用的来源问题。

在旧中国,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几乎没有多少公共产品。国家通过地主豪绅来维持农村的统治秩序,其管理费用由地主豪绅自己解决,实际上,这些费用主要是来自地主向农民索取的地租。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来维持地方的开支,既是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保证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种双重效能,使得地主豪绅能够替国家承担治理乡村的任务。同时,由于管理费用出自地主自己的地租收入,因此这些地主也会节省开支,使基层组织不会存在大量的冗员和开支无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家政权向下延伸到行政村,乡村财政问题也随之提了出来。此时农村基层政权几乎没有公产,其管理费用只能来自国家的税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彻底解决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和公共产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一方面村委会的收入在村经济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需要由村委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开支则越来越大(如道路、自来水、电力、环境卫生、教育、计划生育等等),而村委会由于仅是村民自治组织,既没有财政收入,也无权自行收费。

马鞍村经过 20 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从产业结构、村民就业结构、生活条件以及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看,都已经城市化了,大多数村民已经脱离了农业,农业对马鞍村来说,实际上成为补贴家用的副业。

就基础设施和服务来看,村里安装了自来水、闭路电视、生活电器和电话已经普及,居住条件绝大多数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从商业和服务设施来看,由于马鞍村距胡埭镇仅一公里多,除了村里的小卖部和上门叫卖的小商小贩、服务人员外,大多数购物都是到镇里去。来到马鞍村,如果不是住宅布局的不规则、周围的农田以及零零碎碎的自留地,这里实际上与城市里的小区没有多少区别。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化,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摆在了村委会面前。这就是维持社区运转费用的提高和钱从哪里来?例如道路的建设和维护、供电系统、自来水系统的运转费、环境保护和垃圾的清理费用、以及社会治安费用、学校、幼儿园、卫生室的补贴等等。在城市里,这些市政工程或社区管理费用,一方面是政府通过税收来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物业管理公司收取。但是由于农村的庞大和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政府暂时还不可能对承担起这些已经城市化了的乡村的市政建设和公共开支,但是村委会又不是政府机构,无权去征收有关费用,特别是服务性的费用。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部分村民对村里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不满意,搬到镇里或市里居住,去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不少人存在“搭车”思想,自己不愿意出钱,希望由村委会出钱或募捐来解决,自己坐享其成。如果村里的集体收入较多,这件事情就好办了,由集体出钱,既解决了村委会集资的麻烦,又换取了村民的支持和凝聚力。

目前马鞍村即处于集体收入很少、村民个人较富的状态,因此村委会在公共设施和服务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环境卫生、村内的道路与村的富裕程度很不相称。看来,这将是未来农村城市化要遇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4. 人口流动问题。从马鞍村的历史来看,20世纪最后的10年,是人口流动量最大的时期,这主要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人口流动主要表现出四个趋势:一是人们从经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如苏北人大量流入马鞍村;二是人们从收入低的行业向收入高的行业流